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 ——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夏丽丽, 赵耀龙, 欧阳军, 刘望保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 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 通过半结构化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 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 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 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 企业规模偏小, 生产联系松散, 技术需求极其低下; 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 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 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关键词: 城中村; 制造企业; 空间集聚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2)07-1294-11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珠江三角洲在大量垂直型外来资本的推动下, 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始于1980年代末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重新赋予了城市土地应有的资源价值, 并与分权化、全球化及市场化等进程相互交织, 催生出以土地价格为核心的城市竞争^[1], 征地补偿和土地转让间巨大的价格差异促使城市政府加大征地偏好, 城市用地迅速蔓延^[2], 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乡村在城市高速扩展及城乡二元土地使用制度的支撑下逐渐成为“城中村”。1990年代以来, 城中村内因涌入大量外来人口成为高密度城市移民聚居区, 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3],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海外中国城市研究者对中国城中村现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居住与土地利用。他们对居住问题的研究主要沿三条主线展开: 一是高度关注城中村因涌入大量移民形成的复杂的分层化社会网络及新型的社会空间结构^[4], 从移民居住偏好的角度讨论其集聚机制^[5~7]; 二是与西方自助型社区进行对比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中国城中村承载的社会功能及对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影响, 从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角度探究其形成机制^[8~10]; 三是对城中村内部贫困人口的社会特征进行细致分析^[11,12], 并对其作为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力量进行评估^[13]。学者们对城中村土地利用的研究早期十分关注其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及景观变

收稿日期: 2011-07-13; 修订日期: 2011-12-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001079、40901090、41001088); 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夏丽丽 (1975-), 女, 安徽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企业地理。

E-mail: hslily@163.com

通讯作者: 赵耀龙 (1974-), 男, 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科学和城市问题研究。E-mail: yaolong@scnu.edu.cn

化,对城中村区位及地域范围、内部土地利用类型和巷、道等道路特征和结构进行细致描述^[5],试图从土地利用变化的角度阐释城中村的形成机制。但大多是基于观察的经验分析和定性描述,缺乏系统的土地利用调查和相应的数据支撑。近年来的研究多从土地使用政策和权属关系的角度对城中村形成、土地利用后果、复杂的权属关系及未来改造面临的土地利益分配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2,14]。

与海外中国城市研究者相比,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的研究更加丰富。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对城中村实体空间现象进行阐释,包括对其环境特征、类型划分、形成的经济和制度背景等进行剖析^[15~18];(2)对城中村内部的社会空间进行解析,包括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新型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形成的制度背景^[19~23];(3)在对城中村对城市社会 and 城市化发展负面影响的深入分析基础上,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路径和模式探索^[24~27]。

由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大多基于居住功能之上,重点关注由于外来移民大量聚居而形成的城中村实体空间、移民社会空间及与此相关联的土地利用、景观变迁及未来的空间整治。对其内部经济系统的深入探讨十分有限,并且主要集中在村集体及村民的租赁经济及收益构成分析^[28~30],外来移民的经济行为及其在城中村经济系统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则长期被忽略。实际上,外来移民在城中村内部构建了大量的具有多种产业形态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不仅包括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为村民及外来人口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业,也包括以传统加工业为主体的制造企业^[5,7,31],使城中村具备了独特的产业发展体系,也具备了更为复杂的利益分享和空间管理关系。近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状况^[32~34],但主要限于小型低端服务业,对制造企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本文以广州市康乐村为例,探讨外来移民创建的制造企业的特殊属性、基本经营特征、形成机制以及因为集聚在城中村而具备的空间独特性,以丰富城中村研究内容,为城中村未来的健康发展及空间整治提供思路。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康乐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至鹭江西街、南至康乐中约南新街、西至瑞康路、北临新港西路,是中心市区内一个已完全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的典型城中村(图1)。至2010年,村内户籍人口4000余人,流动人口约33000余人。康乐村内部分为三大社区,分别称为康乐西约、康乐中约和康乐东约,其下又细分为7个经济合作社^①。1996年9月海珠区成立了凤阳街道办事处,2001年开始接管康乐村。康乐村内部制造企业的集聚,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大纺织商圈^②。由于紧邻处于纺织商圈核心位置的广州国际轻纺城,并且拥有廉价的且管理宽松的租赁空间,康乐村内部以流动人口为主体创办的服装制造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蓬勃发展。至2010年,康乐村约0.46km²的土地上,已聚集着上万家服装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沿村内主要道路两侧集聚^③,生产地点包括厂

①即康乐一社、康乐二社、康乐三社、康乐四社、康乐五社、康乐六社、康乐七社。其中康乐一、二、三社由康乐西约管辖,康乐四、五社由康乐中约管辖,康乐六、七社则由康乐东约管辖。

②广州中大纺织商圈因最初的流动摊位位于中山大学南门外空地而得名。

③如村内主干道之一的康乐西街两侧,聚集着大约115家制造企业,仅仅300米长的金纺路两侧也聚集了62家制造企业。

房、住宅、写字楼、仓库甚至巷道，形成独特的工业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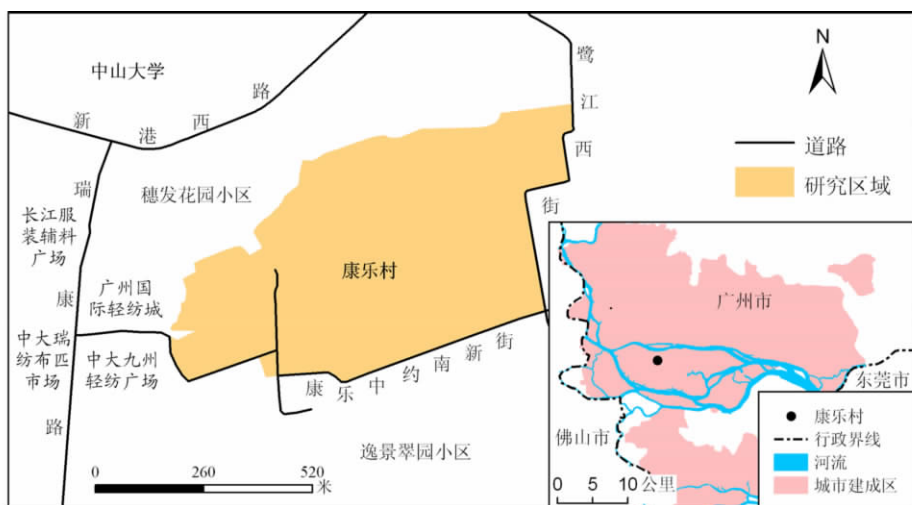


图 1 康乐村及中大纺织商圈区位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Kangle village and Zhongda Textile Business Circle

注：完整的中大纺织商圈包括位于新港西路、东晓南路、逸景路、瑞康路并向东延伸至广州大道南的 30 多个轻纺专业分市场，由于图幅限制，这里仅列出与康乐村生产及销售联系最为密切的 4 个轻纺专业分市场，其中广州国际轻纺城是中大纺织商圈最重要的核心节点之一。

2.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城中村内的制造企业大部分为非正规部门，无论是经营特征还是空间分布，均缺乏正式的官方统计及分析数据，因此，本文的主体数据来自实地调研^①。调研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展开，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为考察康乐村内制造企业生产运营的基本特征，对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在抽样方法上，虽然有确定的抽样框，但由于企业对访问具有普遍的戒备和抗拒心态，随机方法难以实施。本文采用便利及滚雪球两种抽样方法的叠加。共访问企业 450 家，获得有效问卷 428 份，有效率达 95%。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主的基本信息、企业的规模特征、产品生产联系、技术创新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等。同期，成功访谈企业 23 家^②，问题主要包括对康乐村服装纺织业的看法、进驻康乐村的原因、对自身企业发展的展望和计划等。访问样本基本覆盖了城中村内主要的工业空间。其次，进行了康乐村内部土地利用类型的调研，以考察其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具体方法是在航空影像上将全村进行网格化划分，共分成 25 个地块，再分地块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实地勘验，同时对多层建筑的垂直空间利用状况进行调查。土地利用类型的调研结果用 Arcgis9.2 软件进行处理。最后，在上述两类调研的基础上，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访问，包括康乐村居委会，凤和村居委会、凤和村经济

①文中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实地调研。

②本文在研究设计中按企业的规模特征从受访企业中确定了 30 家访谈企业，但实际访谈中发现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对访谈的抗拒心态普遍较强，难以进行深度访谈，因此已完成的 23 家企业均属于小型企业，尤其以员工人数小于 20 人，年产值 50 万元以下，经营面积 50 平方以下的企业为主。

联合社^①及凤阳街道办事处，以了解康乐村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并收集相关数据与图表。

3 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的集聚机制

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实际是中大纺织商圈向制造环节的延伸，是依托专业市场形成的加工制造企业集群，两者间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的循环因果关系，是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空间集聚的重要机制。中大纺织商圈从1990年代初开始兴起与持续扩张，现已发展成位于新港西路、东晓南路、逸景路、瑞康路并向东延伸至广州大道南的30多个轻纺专业分市场组成的大型综合性交易市场，是各类服装面料、辅料、家纺、皮革等纺织品资源的采购地和华南地区集散中心。依托商圈内便捷的采购渠道及密集信息，一些外来务工者中的头脑灵活者意识到将单纯的商业贸易延伸至加工环节蕴涵的巨大商机，开始创办形式灵活，资金、技术门槛低下的作坊式加工企业。紧邻国际轻纺城的康乐村因内部的土地非正规供给^②及低廉租金^③为企业集聚提供了理想空间，与纺织商圈的地理邻近也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企业与纺织商圈的关系邻近。20多年来，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不仅与纺织商圈形成了紧密的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联系，也通过承接各类厂商的委托加工业务，为其构筑了丰富、灵活、廉价、及时的供货体系。城中村内部的非正规管理、开办企业的资金、技术门槛低下及其示范效应加速了企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此后，随着企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关企业集中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开始成为新的集聚因素（图2）。调研结果也表明，超过70%的被调研企业主认为靠近市场^④和相关行业集中是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空间集聚因子（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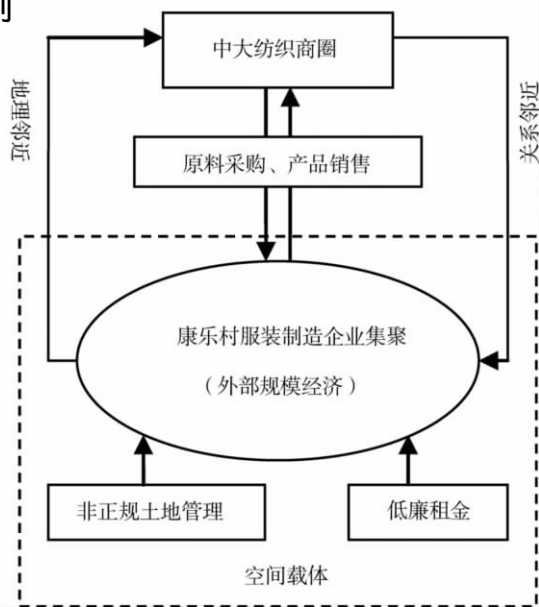


图2 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空间集聚形成机制
Fig 2 The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ocated in Kangle village

表1 康乐村制造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

Tah 1 The main reason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gglomeration formation in Kangle village

| 企业在村内聚 集的主要原因 | 靠近市 场 | 相关行业 集中 | 租金便 宜 | 信息灵 通 | 政府优 惠政策 | 城市基础 设施健全 | 文化的包 容性强 | 其他 |
|------------------|----------|------------|----------|----------|------------|--------------|-------------|------|
| 合计（%） | 48.6 | 28.8 | 8.3 | 2.1 | 0.7 | 0.5 | 0.2 | 10.7 |

①康乐村的行政隶属关系为：康乐村一凤和村一凤阳街道，故对凤和村相关部门进行访问。
②在城中村内，无论是基于村集体行为的“物业租赁”，还是基于村民个人行为非正规住房市场，均不对出租物业的用途进行严格的分类及管制，尤其是后者，几乎对租赁物业的用途不作任何要求。这为城中村内制造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不受土地用途限制、自由地选择生产地点提供了可能性。
③在康乐村制造企业发展初期，厂房租金每月约6元/m²，成为吸引企业集聚康乐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随着纺织商圈的不断发展及企业集聚程度的日益加强，引起租金不断上涨，租金低廉这一优势在逐渐减弱。
④指靠近中大纺织商圈内的原材料和产品交易市场。其中321家接受调研的企业中有250家认为产品的销售信息主要来自市场；336家企业中有276家企业认为原材料购进的主要信息来自市场。所以靠近市场非常重要。

4 康乐村内部制造企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4.1 康乐村内部制造企业的特殊属性

4.1.1 临时性 康乐村内部的制造企业获取短期利益心态明显,企业经营的临时性特征十分突出。对23家企业的访谈结果表明,有19家企业认为这种临时性与城中村本身存在的临时性密切相关。城中村的产生源于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相互的利益妥协,类似于一种临时的制度安排。一直以来,城中村的存在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性的。不管是租住民还是原住民,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城中村未来改造的必然性,然而何时改造和如何改造却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心理预期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中村内部制造企业的经营处处体现对短期收益的过度追求,对随之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却视而不见。由此也呈现出:临时性—获取短期收益—环境、社会、经济问题凸显—加大改造压力—增强临时性的发展怪圈。

4.1.2 内生性 康乐村内部的制造企业主要由流动人口创立和经营,多属内资企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均以国内市场为主,具有较为明显的内生性。这与Wang等学者描述的深圳市城中村内承接的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企业形成显著差异^[31]。调查数据显示,康乐村制造企业原材料购进主要是康乐村内部和广州市内两大区域,两者共占被调研企业的60.5%。在省内和全国市场购进原料的企业分别为15.2%与18%,仅有约3.1%的企业原料购进地为港澳台地区及国际市场。企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其中产品销往全国市场的企业比例高达36.4%,产品分别销往康乐村内部、广州市区和广东省内的企业比例分别介于14~19%之间,产品销往港澳台及国际市场的企业数仅占9.6%。表明康乐村制造企业无论是原材料购进还是产品销售,均以国内市场为主,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

4.1.3 地域的多元性 康乐村制造企业创办人的户籍地呈现出地域的多元性,这与生存型的族裔经济聚居区形成显著差异,与20世纪90年代被学者广泛关注的北京浙江村的服装制造企业发展也具有显著差异。调查数据表明,非广州市户籍的企业主比例高达95.02%,企业主户籍地共涉及全国21个省(或区、直辖市)。其中广东、湖北、湖南三省分别占受访企业总数的31.04%、20.62%和12.32%,是企业主户籍地的三大源区。但从上述三省内部的户籍地构成来看,地域集中的现象并不明显,例如广东省内的企业主户籍散布在包括广州、佛山、汕头、潮州、肇庆、梅州、云浮等在内的14个地市,湖北、湖南两省也分别涉及武汉、荆州、宜昌等7个地市和长沙、张家界、常德等10个地市^①。在以企业主户籍地为核心,以单个企业为基本依托的聚居空间里,地方的力量清晰可见。一般而言,小型企业的工人往往是企业主的家庭成员和亲属,规模较大的企业最主要的员工招聘方式是从家乡规模招聘和内部员工介绍,企业员工的地缘文化背景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不同地缘构成的企业间则形成相对独立的基于不同地方文化和力量的多维社会空间。

4.1.4 非正规性 非正规部门通常指在官方认可和记录之外的那部分经济,在我国,一般可理解为未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经济活动^[33]。城中村内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

①广东省包括广州、佛山、汕头、潮州、肇庆、梅州、云浮、汕尾、揭阳、韶关、清远,茂名、江门、湛江共14个地市。湖北省包括武汉、荆州、宜昌、仙桃、黄冈、天门、孝感共7个地市。湖南省包括长沙、张家界、常德、衡阳、株洲、益阳、郴州、湘潭、岳阳、永州共10个地市。此外,浙江、四川、江西、福建、广西五个省(区)共占被调研企业总数的23.46%;云南、新疆、内蒙古、辽宁、黑龙江、贵州等边远省份(区)也分别拥有部分企业,但比例较小,大致在1~1.5%之间。

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条件使城中村成为城市中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34]，康乐村内的制造企业也不例外。根据凤阳街道提供的数据表明，2008 年整个凤阳街道的工业企业数为 626 家，这与康乐村中实际存在近万家企业的数据相差甚远，表明康乐村内部大部分制造企业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视野，以非正规状态存在^①。这意味着康乐村大部分制造企业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无需接受正规的工商管理和管制，可以自由的变更经营内容和地点。但同时，一旦经营利益受到损害，也得不到任何组织的正式保护。

4.2 康乐村内部制造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

4.2.1 企业产业构成 康乐村制造企业的主体行业为服装制造业。调研结果显示，428 家被调研企业有 422 家为服装制造相关企业，剔除 25 家未具体填写经营内容的企业，403 家受访企业^②的产业结构如表 2 所示。

表 2 康乐村被调研制造企业的产业结构
Tab 2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nvestigated manufacture enterprises in Kangle village

| 行业构成 | | 经营内容 | 企业数（个）比例（%） | |
|-------|---------|------------------|-------------|-------|
| 成衣 | 成衣制作 | 成衣制作 | 170 | 39.72 |
| | 打版、成衣纸样 | 成衣纸样，服装打版，放码，车版 | 20 | 4.67 |
| 配饰与配件 | 烫图、钉珠 | 烫图、烫钻、数码热转移印花，钉珠 | 56 | 13.08 |
| | 绣花、珠片 | 电脑绣花，手摇绣花，穿珠片，珠饰 | 24 | 5.61 |
| | 钮扣 | 服装钮扣、包钮 | 15 | 3.5 |
| | 花边、织带 | 花边、织带 | 12 | 2.8 |
| 面料 | 围巾、皮带 | 围巾、皮带 | 8 | 1.87 |
| | 拉链 | 拉链 | 3 | 0.7 |
| | 面料生产 | 针织品，纺织品，罗纹，丝绸 | 52 | 12.15 |
| | 面料加工 | 面料来料加工 | 23 | 5.37 |
| 商标 | 商标 | 商标生产与设计 | 7 | 1.64 |
| 压折、包装 | 服装压折与包装 | 裁片压折、服装压折、成衣包装 | 4 | 0.93 |
| 其他 | 与服装产业相关 | 凤眼、直眼、针车 | 3 | 0.7 |
| | 与服装产业无关 | 通讯产品、橡胶生产、办公用品 | 6 | 1.4 |
| 总样本量 | | — | 403 | 100 |

被调研企业主要由成衣、配饰与配件、面料生产与加工、商标、服装压折与包装等五大行业构成，其中成衣类企业高达 190 个，占受访企业总数的 44.39%。商标和服装的压折与包装行业规模较小，两者加起来仅占受访企业总数的 2.57%。从行业构成的进一步细分来看，成衣类企业中成衣制作占据了绝对优势；配饰与配件类企业则包括烫图、钉珠、绣花、珠片、钮扣、花边、织带、围巾、皮带、拉链等共六大类，其中烫图与钉珠企业数量最多，占配饰与配件企业总数的 47.46%，其余行业类型显得较小且较为分散。

4.2.2 企业间生产联系 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间并未形成紧密的生产联系。422 家受访企业中，约有 13.5% 认为与其他企业间没有生产联系；另有 63.2% 的企业认为与其他企

①几乎所有受访企业都避免正面回应是否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是否具有“营业执照”，因此很难从问卷样本量中分析非正规企业的比例。政府统计企业数与实际企业数的差值应该可以反映非正规企业的大致规模。
②虽然受访企业中有 25 家未具体填写经营内容，但从企业名称中可以判定为服装类企业，所以共有 422 家企业为服装制造类企业，但具体的产业构成只能以 403 家已填写经营内容的企业为总样本量进行分析。

业间生产联系“一般”^①。对企业间生产联系类型的进一步调研表明,约43.7%的企业为共同生产,也即是加工能力的相互调节;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分别占了26.9%和18.8%;企业间相互融资和技术开发等深层次合作仅分别占1.3%和1%。表明康乐村内企业间的生产联系仍主要停留在相互代工及物料采购,有助于企业技术演进及产业升级的深层次合作则十分缺乏。

4.2.3 企业技术需求 现阶段,康乐村制造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极低,对用工几乎没有专业性要求。调研结果表明,高达75.7%的企业现阶段没有感受到技术研发与投入的压力,86.5%的企业完全没有开始产品的技术研发工作。虽然有超过70%的企业认为目前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竞争对手过多和产品利润太薄,但仅有3.6%的企业认为这与产品技术含量低和技术过时有关。少数希望展开技术创新的企业创新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创新资金极其有限,技术研发工作实际难以展开。同时,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要求极低,仅有24.1%的企业要求工人技术熟练,有71.1%的企业不需要对员工进行任何的岗前技术培训。由于缺乏技术含量,村内企业创办门槛极低但竞争激烈,每年在新企业不断涌现的同时,均有一批企业因利润过低、加工量不足被迫关闭。因此,虽然康乐村产业集聚区已存在20多年,但被调研企业经营时间大多较短,54.4%的企业经营时间不足3年,其中21%更是属于初创。仅有4.6%的企业经营时间超过10年,达到20年的仅为0.2%。

4.2.4 企业规模特征 康乐村内部的服装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422家被调研企业中有92.9%的企业就业人数小于40人,其中小于20人的企业高达79.3%;企业的年产值主要集中在10~50万元区间,大约占被调研企业^②的40%,年产值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仅占11.4%;大约51%的被调研企业^③经营面积不足100m²,其中最小的一家企业仅为5m²。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比例很低,康乐村内部也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其中雇佣员工数超过百人的企业大约占总数的1.4%,年产值超过500万元的企业占2.6%,经营面积超过400m²的企业也大约占了1%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就业人数高达819人,年产值3000万元,经营面积则超过了1000m²。

5 康乐村内部制造企业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

5.1 工业用地总体显得破碎,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

调研结果表明,康乐村内部工业用地约占总用地面积的13%,主要分布在康乐村的中南部、中东部及中北部,其中除中南部是较为连片的工业用地外,其余均与商业、住宅用地相互镶嵌,显得十分破碎。尤其是中北部,与住宅用地几乎难以区分(图3)。从康乐村制造企业行业空间分布来看,西南部和中南部主要为大型成衣制作、纺织面料生产企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钉珠,绣花,烫画等加工企业;东部区域主要分布着面料加工、打版、成衣纸样等小型作坊;此外,在与企业的访谈中了解到,虽然从外部景观上难以辨认,但村中已存在企业内部相认可的“纽扣一条街”、“拉链一条街”、“绣花一条街”等,表明康乐村服装企业已初步形成行业空间的分化与集聚。

①原问卷中关于生产联系程度的描述分为“无联系”、“松散”、“一般”及“紧密”四个档次。但在实际访问中发现由于很难描述“松散”和“一般”在程度上的差别,受访人员的理解容易造成误差,因此统计中将“松散”和“一般”合并,将企业间生产联系程度的描述分为“无联系”、“一般”和“紧密”三个档次。

②422家企业中有137家企业拒绝回答产值规模,故此项调研的样本量为285家企业。

③422家企业中有30家企业拒绝回答经营面积,故此项调研的样本量为392家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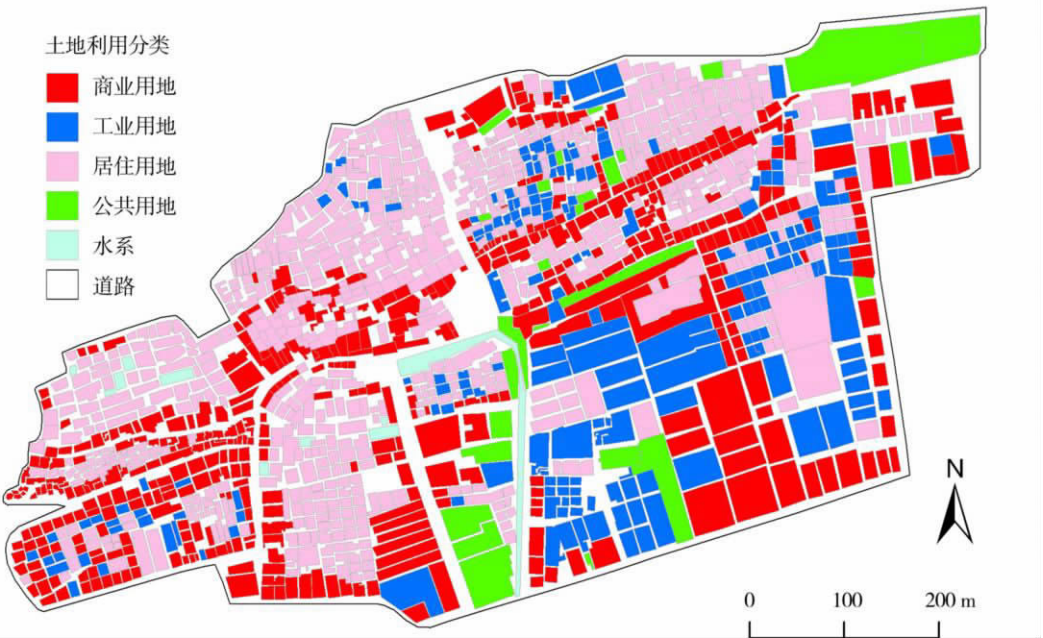


图 3 康乐村土地利用现状
Fig 3 The land use status in Kangle village

5. 2 产业空间附着在居住空间中

康乐村内部大量的制造企业分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楼内。在城中村内，无论是基于村集体行为的“物业租赁”，还是基于村民个人行为的非正规住房市场，均不对出租物业的用途进行严格的分类及管制，尤其是后者，几乎对租赁物业的用途不作任何要求。这为城中村内制造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不受土地用途限制、自由地选择生产地点提供了可能性。调研表明，有 50.94% 的受访企业生产车间的空间性质为住宅，其中 13.74% 为单纯的住宅楼，其余为商住混合楼。在这些密集的，原本用于居住的建筑物内，从第一层到顶层，都有可能被制造企业所占据。在企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一栋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楼内，就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造企业。这些位于住宅楼中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除非进行实地的逐一勘查，否则很难区分究竟是居住空间还是制造业工厂。此外，大约 2.13% 的企业将生产车间设在写字楼，约 3.55% 的企业将生产地点设在包括商店、仓库、巷道等在内的其他地点，充分体现了城中村内制造企业生产地点的多样性和随意性。

5. 3 垂直空间混合利用

康乐村内的多数楼宇在垂直方向上发生了建筑功能的分异。调研结果表明，由于级差地租在垂直方向上的体现，建筑物首层的主要用途是商业，第二是居住，另有约 18.36% 的首层用于制造业；在建筑物的二层，居住变成了首要用途，制造业的比例也发生了明显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到了三层，也有大约 22.82% 的建筑物用于制造企业（图 4）。在制造企业内部，其典型的空间利用特征是：利润较高的企业同时租赁出租屋的首层和二层（有时也包括三层）分别作为生产用地和员工宿舍；利润较低的企业则租赁二层或以上（甚至顶层）楼层，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形成城中村内特有的工业、商业

及居住用地在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景观。

5.4 企业空间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

村内企业由于原料和产品运输的需要多沿街分布,道路系统对工业用地的分布影响十分显著。城中村内的道路系统大都缺乏规划,除了屈指可数的主街道外,其余道路狭窄弯曲,缺乏标识且难成体系,加上各种违章建筑和占道经营造成的交通瓶颈,各级道路的输运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此造成的租金差异成为影响企业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调研结果表明,康乐村位于主干道两侧的出租屋每月租金大多为40~60元/m²,最高可达130元/m²,次干道两侧的租金则大致为20~30元/m²。一般而言,在村内交通较为顺畅的主干道两侧,往往分布着对交通条件要求较高且付租能力较强的大型成衣制造企业,次干道两侧则分布着规模较小,利润相对较低的面料加工及配饰与配件类企业。在交通更为不便、主要靠楼间空隙通行的密集居住区内,则分布着规模更小,利润更低,原材料和产品主要依靠人力运输的小型作坊式加工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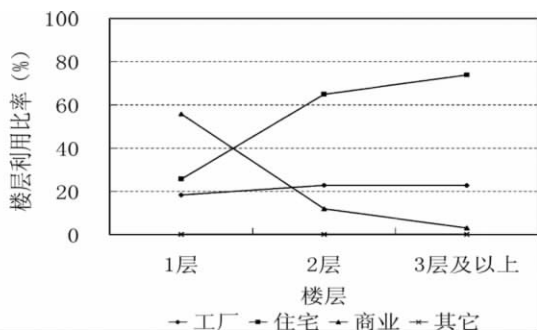


图4 康乐村建筑楼层利用状况

Fig. 4 The utilization condition of buildings in Kangle village

6 结论与讨论

(1) 优越的区位条件、以物业出租为基础的寄生型经济以及土地利用管制的缺失,使得城中村这一特殊的城市化空间呈现出经济、社会功能的多面性。其中,流动人口构筑的各种非正规部门成为展现其社会、经济功能多面性的重要支撑。这不仅与西方国家贫民窟或自助型社区存在较大差异,与一般的城市经济区也具有显著差异。对流动人口构筑的各种经济部门的研究应当成为城中村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 康乐村服装制造企业与大中纺织商圈形成的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的循环因果关系是其空间集聚的重要机制,城中村特殊的空间性质为这种集聚提供了空间可能。由于集聚在城中村,康乐村制造企业的生存背景、经营特点及空间集聚特征均具有了鲜明的“城中村”烙印。“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非正规性”是其具有的特殊属性,也是其生存背景的集中体现。企业经营特征表现为:总体规模偏小,主体行业为服装制造业,但企业间并未形成紧密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技术需求极其低下。空间集聚特征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附着在居住空间中、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3) 城中村对制造企业的接纳,为外来工群体提供了低门槛的创业空间,但却加剧了空间混乱,使得城中村的空间异质性更加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性将伴随着临时性的预期增强而逐渐增强。作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得以保留的村民聚居点,城中村其实不应该承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但所谓的管理不能只是一味的驱赶,农民工在城市中低门槛创业空间的缺失应当引起城市规划者的思考。同时,村集体与村民仅靠出租获取收益的经济行为及其衍生出的寄生经济如何管理也值得关注。

致谢：感谢朱竑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康乐村居委会、凤和村居委会、凤和村经济联合社及凤阳街道办事处在本文调研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007 级学生在康乐村实地调研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参考文献：

- [1] 罗小龙. 转型中国的地方管治：海外学者的观点. 人文地理, 2009, 24(6): 24~28.
- [2] Tian L, Ma W J.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A tool of land supply. Land Use Policy, 2009, (26): 599~609.
- [3] 魏立华, 闫小培.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 管理世界, 2005, (8): 48~57.
- [4] Ma L J C, Xiang B.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5): 546~581.
- [5] Liu X L, Liang W. Zhejiangcun: 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informal urbanization on the periphery of Beijing. Cities, 1997, 14(2): 95~108.
- [6] Wang C G. Communities of provincials in the large cities: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1995, (2): 15~21.
- [7] Beja J P, Bonnin 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Zhejiang village. China Perspectives, 1995, (2): 21~25.
- [8] Zhang L, Zhao S X B, Tian J P. Self-help in housing and chengzhongcu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3, 27(4): 912~937.
- [9] Leaf M. A tale of two villages: Globalization and peri-urban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Cities, 2002, 19(1): 23~31.
- [10] Chan R C K, Yao Y M, Zhao X B. Self-help housing strategy for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3, (27): 19~35.
- [11] Liu Y T, He S J, Wu F L, et al. Urban villages under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Unregulated assets and transitional neighbourhood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0, (34): 135~144.
- [12] Zhang L. Conceptualizing China's urbanization under reform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8, (32): 452~470.
- [13] Liu Y T, Wu F L. Urban poverty neighbourhoods: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under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Geoforum, 2006, (37): 610~626.
- [14] Tian L. The chengzhongcun land market in China: Boon or bane? A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8, 32(2): 282~304.
- [15] 敬东. “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 城市规划, 1999, 23(9): 8~14.
- [16] 张建国. 广州城中村研究.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132~176.
- [17] 黎云, 陈洋, 李郁. 封闭与开放: 城中村空间解析——以广州市车陂村为例. 城市问题, 2007, (7): 63~70.
- [18] 全德, 冯长春, 邓金杰. 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1(3): 437~446.
- [19] 李培林.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1): 168~179.
- [20]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9~141.
- [21] 蓝宇蕴.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2): 144~154.
- [22] 蓝宇蕴. 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23] 何深静, 钱俊希, 吴敏华.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 地理研究, 2011, 30(8): 1508~1519.
- [24] 李俊夫. 城中村的改造.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160~195.
- [25] 郑静. 论广州市城中村的形成、演变与改造对策. 规划与观察, 2000, (1): 17~21.
- [26] 李晴, 常青. 城中村改造实验——以珠海吉大村为例. 城市规划, 2002, 26(11): 23~27.
- [27] 闫小培, 魏立华, 周锐波. 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市规划, 2004, 28(3): 30~38.
- [28] 谭刚. 城中村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及主要特征——深圳市福田区城中村调查. 开放导报, 2005, (3): 51~55.
- [29] 李立勋. 城中村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广州市典型城中村为例. 北京规划建设, 2005, (3): 34~37.
- [30] 周锐波, 闫小培. 集体经济: 村落终结前的再组织纽带——以深圳“城中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09, 29(4): 628~634.
- [31] Wang Y P, Wang Y, Wu J.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4): 957~973.

- [32] 尹晓颖, 薛德生, 闫小培.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 经济地理, 2006, 26(6): 969~973.
- [33] 尹晓颖, 闫小培, 薛德生. 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部门与城中村改造. 现代城市研究, 2009, (3): 44~53.
- [34] 薛德生,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管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6): 1390~1398.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engzhongcun: A case study of Kangle village, Guangzhou

XIA Li-li, ZHAO Yao-long, OUYANG Jun, LIU Wang-bao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Villages-in-the-city (i. e. Chengzhongcun), as distinctive urban spaces in Chinese citie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Few literatures, however, have focused on the basically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ormal sectors run by migrants in Chengzhongcun. In fact, due to non-strict regulated situation, low-rent housing market and favorable location, Chengzhongcun has become ideal areas for the agglomeration of informal economic sectors. Although most of these informal economic sectors are sorts of neighborhood service, there are probably som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Kangle village in Guangzhou, a typical Chengzhongcun with booming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the basic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in Chengzhongcun. Field work is carried out to obtain economic data using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rough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428 owners or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enterprises selected by convenient and snowball sampling. Location of the samples covers major manufacturing area in the village. In addition, land-use pattern of the village is investigated by dividing the whole village into small grids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factories in the center of Kangle village are garment processing workshops built by migrants. The factories have the attributes of temporality, endogeneity, the diversity of native places of owners, and informality, and the basic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are small scale, loosing production linkage with each other, and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reover, many workshops are situated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road and alley network in the village. Industrial,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land is mixed in vertical space, and factories with similar products are relatively agglomerated.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Kangle village are not passively isolated only by low cost, but are actively agglomerated because of both low cost and favorable location.

Key words: Chengzhongcu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patial agglomeration